

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曹爱生

(盐城市博物馆 江苏 盐城 224006)

摘要: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而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中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朝廷政策性救济和民间互助性救济是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形式,两淮大小盐官们是实际操作者。

关键词:清代;两淮盐政;社会救济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6)01-0012-04

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赋收入,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至于受到威胁,统治者们在对盐民敲骨吸髓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一下灶民的生活与生存。本文拟就此谈谈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一、清代两淮盐政中要实行社会救济的原因

1. 恶劣的生存环境、频繁的自然灾害是清代两淮盐政不得不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原因

在清代,两淮灶民的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两淮地区在古代一直是“滨海斥卤之地,地号不毛”,既远离都市,又极其荒凉。这里除了耐咸的蕮草外,什么也不长。这里的水也是咸的,人们不得不开凿水井,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用水。古代的两淮是生活、劳动都极其艰辛的地方。被迫在这里充当灶丁的,一般都有政治或经济原因。对此,我们可以用对两淮盐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两次移民来证明。两淮海盐肇始于汉代,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为与中央抗衡,就曾招募天下亡命人在这里煎盐。元末明初的朱元璋打败与自己争雄的张士诚后,就把曾支持张士诚的大批苏州等地居民驱赶到这里,以示惩罚,俗称“洪武赶散”。因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两淮制作海盐(尤其是淮南)的地区可以视为各类亡命人的避难所和流放地。在这里栖住的灶民,不仅“穴居露处,魑

魅与之群”^{[1] 卷155p. 11},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且劳动条件也异常恶劣。淮南煎盐,因“以目烁于火也”,故“煎盐之户多盲”;淮北晒盐,因“以骨柔于咸也”,故“晒盐之户多癯”。因为生存环境恶劣,两淮灶丁逃亡极多。为保证煎盐必需的劳动力,清沿明制,煎户隶灶籍,依例不得在官府当差,不得投充军下,亦不得卖身为奴。从清初到清末,这个制度始终如一。而且,凡身隶灶籍的盐民,其子孙后代只许以盐为业。

古代的两淮自然灾害也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在乾隆统治的六十年中,两淮地区的盐场就发生自然灾害32起。自然灾害的类型为旱灾、涝灾,以水灾最为严重,有25起。虽然在淮南有闻名遐迩的范公堤,但由于海岸线不断东趋,清代的淮南盐场已集中在范公堤以东。所以,就淮南灶民抗灾这一点来说,以抗御海潮而著名于世的范公堤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两淮盐场又处在淮河下游,这一地理位置,又使这里的水灾呈东西夹攻的态势。西水是指西边的湖水下压。两淮处于淮河下游,是淮河下泻入海的出口处,雨水多的年份,上游的湖水下泻,地势低洼的盐场则成为泽国。东水为海潮上涨倒灌。两淮灶场既是无屏障的面临海滨,灶场内又多是一马平川,极易成灾。有些年份因雨水过多,甚至会形成“海潮上涌,湖

* 收稿日期:2005-11-26

作者简介:曹爱生(1955-),男,江苏阜宁人,盐城市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海盐文化研究。
万方数据

水下趋^{【1】卷142p.14}的局面。水灾时,灶民们只能靠人工堆成的潮墩避难。而潮墩并不能保证灶民的安全。因为有的时期,潮墩年久失修(如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时期);有的灶场远离潮墩(因海岸线东趋,制盐要卤气,灶场随之东移所致)。所以大灾年份,甚至会出现灶民“无户报灾,无丁领赈”^{【1】卷37p.1}的惨况。旱灾对灶民生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是卤气不升,产量下降;二是河水下降,难以运输。

2. 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不得不实行社会救济的主观原因

自汉代起,两淮地区一直是我国海盐的重要生产地,一直是历代王朝赋税的重要来源。清代的盐课收入在国家整体赋税的比重虽然较以前有所下降,但仍是“田赋和盐课相当”。而在盐课的收入中,又以“两淮最巨”,史称“两淮地大物博,货货闾溢,为浙、粤、川、芦所不逮。”^{【1】卷146p.1}据《两淮盐法志》中载:“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浙十八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各有奇。”^{【1】卷156p.19}以上所列数字仅为正课,顺治年间,将“浮费皆编入额课,故每引课银淮南加至一两一钱七分,淮北加至一两五分,遂成定制。淮南派行一百三十九万余引,淮北派行二十九万余引。每年共征课一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九十余两。……而杂款币息尚不与焉,其解部送织造、河工、铜脚,共银三十二万两。”^{【1】卷155p.34}

两淮的巨额盐课(折价银)在清代的国家财赋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淮行盐,国课攸关”^{【1】卷1p.6},不仅维持着清王朝这台古老的机器不停的运转,甚至关系到清王朝的命运。如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时候,剿灭太平军的湘军、淮军的军饷无不依赖于两淮的盐课。因而,统治者们对淮盐的产运销极为重视。他们重视两淮盐政官的选用。在太平的时期,两淮盐政官多为信得过的宠臣;在战乱的时期,两淮盐政官多为身系朝廷安危的权臣。如曾国藩、曾国荃等。这些肩负重任的两淮盐官们无不重视两淮盐政的管理,对淮盐的产运销的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一整套极其完备的制度。诸如严禁私垦草荡、严禁私卖荡草以保证原料;严禁私铸锅炉、严格火伏制度以保证额产;严查灶丁数目、颁布保甲法令以保证人力;划分销售引岸,不准越界私卖以保证销路等等。在

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两淮盐政的大小官员们并没有忘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对灶民们施以必要的救济。因为他们也知道“两淮盐课百余万,安所取之?取之于商也。商安所出?出于灶也。”^{【1】卷155p.114}若不亟思拯救,恐老弱者填于沟壑,少壮者另作他图。”^{【1】卷144p.9}即不仅可能影响两淮海盐的生产,影响朝廷的盐课,而且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总之,无论从“民生”,还是从“国计”,清代两淮盐政都得重视对两淮灶民进行社会救济。

二、清代两淮盐政中的救济体制

如果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体制,我们不难发现,还是比较完备的。

清代的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方法措施很多,救济的覆盖人群也较广,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按实施救济的主体来分,可分为朝廷的政策性救济、民间的互助性救济;按实施救济的时间来分,可分为长期的稳定性救济、临时的突击性救济;按实施救济的物质来分,可分为货币救济、实物救济;按实施救济的方式来分,可分为有偿救济、无偿救济等等。

1. 朝廷的政策性社会救济是主体

其中有些是长期的,也有临时的;有些是有偿的,也有无偿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根据灾情严重程度“或蠲或赈”(蠲,豁免、减免、缓交盐课;赈,救济)及对确需救助的人群实施一些优惠政策。前者的例子很多,如康熙五年,“吕四场荡地冲塌大半,又兼潮灾,男妇淹没,仅存百余丁,责其纳二千余两额课,势所不能。今免输一半。”康熙三十八年,巡盐史卓琳上奏,“以白驹等十四场水灾,请豁免三十七、八两年应征折价盐课三万三千六百九两有奇”,后“奉旨依议”。雍正一年七月,“通泰淮三分司所属丰利等二十九场悉被潮淹”,灾情极重,仅“白驹、刘庄、庙湾、伍佑、新兴、板浦六场共计溺死四万九千五百五十八口”。两淮盐政官在上报朝廷批准后,除将“未完折价钱粮四万余两悉行蠲免”外,还“随钦遵支盐课银一万五千两”,按“被灾轻重、人口多寡”进行赈济。“至重者,每大口赈银一两一钱二分,每小口赈银五钱六分;次重者,每大口赈银六分九厘,每小口赈银二分七厘”。有些受灾较重的年份,除蠲免盐课外,还根据各灶场的灾情给予实物赈济;“每大口月给米一斗五升,小口减半”。倒塌的房屋给银

修理；草房每间给予银四钱五分，瓦房每间给银七钱五分”。“淹毙、压死的男妇丁口”，亦给银两善后；“每大口给棺殓银一两，小口减半”。如乾隆十二年七月，通泰淮三分司所属二十五场遭灾，除“蠲免乾隆十二年应征十一年折价银七千九百七十五两有奇”、缓征当年盐课（应征银数分作三年二年带征）外，抚恤赈济“共用银四万九千二两有奇”；“坍房修费计银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八两一钱，棺殓之资计银六百八两”^①。后者的例子也有一些。如清王朝要确保两淮盐课收入，对私盐查缉很严，因为“疏销首重缉私”，但对确需救助的人群却实施了优惠的政策。“两淮止有贫难小民，许其负盐40斤，并无老幼之分，应照浙例，于贫难小民60岁以外、15岁以内以及残废者，许其于不销官引地方负盐四十斤，易米度日。”^②在凶气下降、不便煎晒的春寒两季，两淮盐政官则动用公款供“生计拮据”的灶丁借领，“春借冬还，不必加息”，避免了他们“重利借贷”。乾隆十六年十月，两淮盐政官吉庆“奉上谕”，在“公项内”动用白银数万两无息借贷给灶丁。此外还有“寒付”。为解决贫苦灶户“无盖藏”之苦，在冬令之时，用库银预支来年盐价，以“藉资济灶”^③。

2. 民间的互助性社会救济是必要的补充

两淮灶民皆为“贫难小民”，实施这部分救济的主体应是盐商。因为“灶赖商运，商赖灶煎”，相互间实为“唇齿相依”，所以把两淮盐商出资的救济称为“民间的互助性社会救济”。

以两淮盐商为主体的民间的互助性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有捐资赈灾及捐资兴办各种救助性质的慈善机构。

在清代，当两淮灶场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时，盐政官们十分注意利用两淮盐商的财力来赈灾。康熙三十年及四十九年，“并茶场先后被潮，共坍缺荡地折价银一千八百一十二两有奇，贫灶无力完纳，淮南众商情愿代输。”乾隆十一年九月，“淮商众商程可正等以今岁河湖盛涨，公捐银二十万两。”^④乾隆十八年秋，通泰淮三属被水，两淮商人捐银三十万两。”乾隆三十六年七八月，“海属之板浦、徐渎、中正、莞渎、临港、兴庄等场及通属之余东、余西二场被潮水”，淮南北众商“于通海二仓中借谷一万六千九百六十石给息一月口粮，秋成后公捐买谷完仓，不销正额。并海属三十六年压征三十五年分折价未完灶欠一万三百八十余万方数据

两淮众商分带捐完，以纾灶力。”^⑤查《两淮盐法志》的《捐输门·助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两淮盐商为主体的民间互助性社会救济为有效的发挥其作用，还捐款设立了一些长期的或临时的救助机构。这些救助机构主要有盐义仓、棲流所、残废局、育婴堂、施棺局、义渡、救生船、粥厂、书院等。这些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救助机构，统治者称“舍商捐，更无他策。”^⑥

盐义仓的作用是积谷备赈，赈济对象是灶民。其方法是“每年于青黄不接之时，照存七柴三例，出陈留新，米贵时，平柴，倘地方有赈济之用，题请动支”。清代盐义仓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而两淮盐义仓则建于雍正三年，时，两淮盐商共捐银二十四万两，盐院拨公务银八万两建仓，四年正月，雍正帝赐名为“盐义仓”。从此，盐义仓一直存在并有所发展。清代两淮的盐义仓较其他地区的盐义仓相比，有以下特点，分布的范围广，设立的数量多，谷米的储量大。两淮灶场内共有盐义仓九个，另有扬州府治四个（后在光绪七年增加一个）。谷仓储藏谷米最多时达68.8万石。其中最大的为盐城仓，额定储藏量为5.8万石。据史料统计，自雍正四年至道光年间，两淮盐义仓在一百多年内就以不同的形式（赈济、平柴、出借）动用了65次，其中赈济的有34次。实际救助时，采取的方法是先动支义仓谷米赈济救急，后在粮食收获之时由盐商支付银两买谷米完仓。发放的标准为“每大口月给米一斗五升小口减半”，且谷米搭配。赈济时间则视灾情的程度，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等，最长的赈济时间达五个月。如“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一、二等日，沿海风潮”，通泰淮三分司灶场均遭灾，后“庙湾等处五场查明男妇大小四万二千六百一十口，赈济三个月，按一米二谷核给，共动用仓谷三万二百五十石有奇”^⑦。

由两淮盐商捐资兴办的棲流所、育婴堂（在东台兴办的称保婴堂）、残废局（也有称普济堂、同善堂）则是按救助对象的不同特点而设立专门救助机构，其功能与今相似。在清代，两淮盐商还捐资兴办了专门以“矢志、孤苦无依”的女青年为救助对象的崇节堂、立贞堂，这种机构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

至于两淮盐商捐资设立的施棺局、义渡、粥厂、书院等慈善机构，其作用从名称可以想见。

三、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运作主体及效果评估

1. 实施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运作主体应该是以两淮盐政官为首,包括负责各场煎务的大使在内的大小盐官们

朝廷的政策性社会救济自不必说,即使以两淮盐商为救济主体的民间互助性救济,两淮大小盐政官员们在其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资金的筹措上。

清代的两淮海盐为国家专营,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官督商运商卖。由于淮盐的质量上乘,销售的引岸又广,时称“六省行盐”。丰厚的利润,使盐商们趋之若鹜。彼此为争夺营运、销售权的竞争激烈。为实现公开、公平、公正,两淮盐政甚至采取在验明盐商资金的前提下,用抽签来决定运销顺序的方法。另一方面,盐商们在运销淮盐中也收入颇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有这些,都是两淮盐政得以调用盐商的财力、也是两淮盐商愿意(或被迫)用自己资金来进行社会救济的现实基础。

盐政官筹措两淮盐商资金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把救济所需的资金分解到“盐引”中去,即每引加捐若干,按引捐助。这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摊派。另一种是根据赈济及其他需要,动员盐商们一次性捐献。前一种方法为常用的方法,如同治十三年,因赈济“淮南每引捐银八钱,淮北捐银六钱”。后一种方法为突击性捐献,这种捐献常常伴随“议叙”(赏赐官职,均为虚衔)这一鼓励

措施。如乾隆七年“淮商汪应庚以淮扬水灾捐银六万两,两淮商人黄仁德等公捐银二十四万两,奉旨著加恩议叙”。乾隆十一年“淮南商众程可正等以今岁河湖盛涨,公捐银二十万两,……按各商银数之多寡分别叙议”^[1]卷147p. 12。就“议叙”这一奖励措施来说,也有一些规定。一是“捐银不足五百两者例不议”;二是赈捐邀奖,所赏赐的官职“均不得逾五品”;三是经赈捐、已得到五品官职赏赐的盐商再行赈捐时,可将所得奖赐“移奖弟子”,但“不准移奖异姓”^[1]卷149p. 17。两淮盐政官们就是依靠这软、硬两手,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法,为两淮灶民的民间性社会救济筹措了大量的必需资金。

2. 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实际效果评估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估计其积极意义。以扶困济危为特征的社会救济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缓冲器,尤其是在少数人富有,富得流油;多数人贫穷,穷得一无所有,穷得无以为生的时期,社会救济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维护两淮海盐的生产的正常进行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生产水平异常低下、社会制度极其腐朽的清王朝,这种社会救济所起的作用究竟有限,它只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的应急性措施;在多发的自然灾害面前,也仅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措施。既不可能有效的抗御自然灾害,从根本上改变两淮灶民的悲惨命运,也不可能彻底的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两淮盐法志[Z]. 刻本. 光绪三十二年编纂.

Social Relief of Management Lianghuai Salt in the Qing Dynasty

CAO Ai - sheng

(Yancheng Municipal Meuseum ,Jiangsu Yancheng 224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we discuss in historical details the obsective and subjective causes of the social relief in the Lianghuai salt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Qing dynasty ,owing to the adverse living circumstances ,the frequent natural calamity ,the stable salt production and the assurance of the income from the salt affairs. We alslo discuss that the ways of social relief ,the imperial policy relief and the people - to - people relief were the two main forms of the social relief. Finally ,we expose that all thos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Lianghuai salt affairs were the true manipulators.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Lianghuai salt government affairs ,social relief
万方数据